

运城珍宝馆

绿釉三连吊灯：穿越千年的艺术之光



□记者 韩立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灯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不仅具有实用功能，往往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东汉时期的绿釉三连吊灯，便是这样一件独具魅力的文物，它通高20厘米，灯高7厘米，出土于盐湖区北城街道东留村，红陶材质，由碗形三盏组成，中有吊环，施有绿釉。这盏灯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，向人们诉说着汉代陶灯制作的辉煌。

从材质上看，红陶质地细腻、坚硬，是当时制作灯具的理想材料。红陶的使用不但体现了汉代工匠对材料特性的熟悉与掌握，更反映出当时制陶工艺的成熟。这种材质不仅使灯具坚固耐用，还为绿釉的施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。

三连吊灯的造型设计体现了汉代工匠的巧思。三个灯盏呈三角形分布，既扩大了照明范围，又保持了整体的稳定性。中间的吊环设计，既方便悬挂，又起到了平衡重心的作用。这种设计理念，至今仍令人叹服。绿釉的施挂则为灯具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，绿釉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，既美观又富有艺术感。

汉代是陶灯制作发展最为精彩的时期，这盏绿釉三连吊灯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。在那个时代，社会经济繁荣，文化艺术蓬勃发展，人们对灯具的需求不仅注重实用性，更追求美观与艺术价值。因此，汉代陶灯的造型丰富多样，有动物造型的陶灯，如朱雀灯、羊形灯等，这些灯具将动物的形态与灯具的功能完美结合，既生动形象又富有创意；还有人物造型的陶灯，如俑座铜灯，展现了当时的人物风貌和社会生活。

绿釉三连吊灯的出土，为我们研究汉代的社會生活、文化艺术和制陶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通过这盏灯，我们可以想象东汉时期人们的生活场景：在夜晚，一家人围坐在绿釉三连吊灯下，享受着温馨的时光。柔和的灯光照亮了房间，也照亮了人们的生活。这盏灯不仅

文物名片

主角：绿釉三连吊灯
出生时间：东汉
尺寸：高20厘米、肩宽25.5厘米
藏宝地：盐湖区博物馆

是一件照明工具，更是当时人们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的体现，它展现了汉代工匠将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能力。它的造型设计、釉色运用，对现代工艺美术设计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从制陶工艺的角度来看，绿釉三连吊灯展示了汉代工匠高超的技艺水平。从陶土的选取、制作成型到施釉烧制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工匠们精心操作。红陶的制作需要掌握好陶土的湿度和火候，才能使陶质细腻、坚硬；绿釉的施挂则需要掌握好釉料的配比和施釉的厚度，才能使釉色均匀、亮丽。这些都反映出汉代制陶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

这盏绿釉三连吊灯，不仅是汉代工艺的见证，更是古人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。在它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先民们对光明的追求，对美的向往，以及对生活的热爱。



□记者 王捷

提及“秦半两”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。作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的标准货币，半两钱不仅象征秦始皇在货币领域的统一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，更对后世货币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是古代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。而制作半两钱的模具，同样承载着这份荣耀，成为解开古代铸币技术之谜的钥匙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。盐湖区博物馆珍藏的西汉半两钱石范，就是最好的印证。

“范”，是古代用来铸造青铜用具的模具。所谓的“石范”，即用石料制作的模具。石范铸造是一种铸造方法，需要将两个石范对扣起来，将融化的铜水浇铸其中，待铜水冷却，卸下石范，所制作的物品就基本成形了。石范耐高温，可反复使用，但由于石料坚硬不易加工，所以一般只铸造相对简单的钱币、兵器、工具等。而随着制陶业发展，人们开始使用陶范，所以出土和传世的石范并不多，也因此更显珍贵。

这件西汉半两钱石范，是1991年由盐湖区北相镇曹允村的村民捐送的。不难看出，石范的制作工艺颇为精湛。其为双面范，两面都可以用来铸币，多片配套叠压一起浇铸，大大提高了铸币效率，满足了铸币需求。其长21厘米~23厘米、宽7.8厘米、厚1.8厘米，范面经过精心打磨，钱型雕刻规整，浇注口设计科学。一方有17枚“半两”钱模，底部3枚，两侧各7枚，排列整齐。钱模直径为2.48厘米，穿径0.8厘米，钱文是阴文小篆“半两”，字体古朴。范面的磨损痕迹，也表明它曾被频繁使用过。

纵观中国历史，货币制度可谓种类繁多，丰富多彩。夏、商时期，人们最早使用的具有实物货币性质的等价物是“海贝”。随着社会发展，出现了金属铸币，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国独自发展，货币形制繁杂多样。半两货币历经战国、秦、汉三个时期，在我国古代货币史上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。其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秦国，秦统一六国之后，就将半两钱作为全国统一法定货币，使全国的货币形制、重量和单位实现了标准化，大大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流通和贸易往来，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，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。西汉初期，基本沿用半两钱，其重量标准发生了变化，半两钱的铸造工艺不断改进。随着汉武帝时期废除半两钱，推行五铢钱，半两钱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石范的发现，无疑为我们研究货币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西汉半两钱石范，见证了西汉时期的货币铸造工艺和经济发展状况，体现了当时的范铸技术，也为我们研究西汉时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工艺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参考。

不难想象，工匠们在制作石范时的游刃有余和精益求精，先选择一件优质石材，再切割、打磨制成范坯，然后在范面上雕刻出钱模和钱文，最后精细修整……石头无言，但历史和文明震耳欲聋。这件西汉半两钱石范，就像是承载着一段厚重历史的文化烙印，为我们体悟中华文明独有魅力打开了一扇窗户。透过它，我们仿佛窥见工匠们铸造钱币时的忙碌身影和西汉时期的经济面貌，感受到历史的沧桑与变迁。

文物名片

主角：半两钱石范
出生时间：西汉
尺寸：长21厘米~23厘米、宽7.8厘米、厚1.8厘米
藏宝地：盐湖区博物馆

象牙腰牌：宫廷规制的独特见证

文物名片

主角：象牙腰牌
出生时间：明代
尺寸：长14.5厘米、宽5.8厘米
藏宝地：盐湖区博物馆

□记者 薛丽娟

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每一件都有着相应时代的独特印记。在盐湖区博物馆珍藏有一块明代象牙腰牌，其造型精巧、工艺精湛，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，同时也是佩戴者特殊身份与阶层的象征。尤为珍贵和特别的是，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保存有一块规制、形状乃至铭文都相同的腰牌，仅个别字的笔画不同，这也侧面反映出此类腰牌在当时的制作有严格的标准和规制。

这块腰牌的形制规整，呈钟形，长14.5厘米，宽5.8厘米，选材为象牙，这在明代腰牌中较为典型。其工艺精湛，上端精雕着浮云纹，中部设一圆孔，方便穿系绳索，使用时系于腰间，便于查验。正面以楷书浅刻文字，“九官长随悬带此牌，不许借失，伪造。升迁者改写兑换，事故者缴监。无牌不许擅入官禁，违者治罪”，明确界定了佩戴者的身份范围，对腰牌的使用、保管、变更及违规惩处等方面都作了细致规定；侧面刻有“崇祯八年制”，标明了制作年代，为研究其历史背景提供了确切的时间

坐标；背面刻“御马监”，指出了所属机构，体现了明代宫廷内复杂的职官体系与分工。

众所周知，古代的帝王宫城门禁森严，不论朝廷军政大臣、皇亲国戚，还是当差行走出入的，都必须持有出入证。腰牌作为出入宫廷的重要凭证，一直发挥着“通行证”和“身份证”的作用。尽管历朝历代腰牌在质地、款式、规格、铭文等方面有所不同，但其核心作用始终未变。到了明朝，牙牌制度的出现，标志着明代官禁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化，为明代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。自洪武年间起，象牙被用于制作腰牌，这类腰牌也被称作“牙牌”，彰显着明代宫廷用品材质选取上的特定标准。

在明代，皇城门禁森严，内官群体庞大，相应的检查制度也十分严格。洪武初年，朱元璋在内官设立了“十二监”，与“四司”“八局”共同构成“二十四监”或“二十四衙门”。在“十二监”中，每监各设太監一员，正四品；左、右少監各一员，从四品；左、右監丞各一员，正五品；典簿一员，正六品；长随、奉御无定员，从六品。由此可知，太監官位为正四品，长随是其中级别比较低的职务，定为从六品。然而司礼监和御马监因深受皇帝宠信，拥有着远超其他监司的影响力。到了洪武二十八年，“二十四监”的编制和级别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其中长随的官阶升为正六品。

从相关记载中可知，御马监作为核心部门，具有掌管御厮兵符、与户部分理财政等涉及军事、财政方面的



职能。长随作为正六品的中级太監，日常出入宫门时，牙牌不仅是他们得以顺利出入宫廷的通行证，更是其特殊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识。

象牙腰牌作为官吏出入宫廷的凭证，在河东地区出现意义非凡。一方面证明，河东是中原文化核心区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活跃。腰牌可能经官员调任、赏赐等途径流入，比如夏县有一郭敬祖莹，证实宦官郭敬曾在宫廷任职期间回到河东，所以是河东某位宦官还乡时带回也有可能。另一方面，腰牌承载着明代宫廷文化和职官制度信息，反映出河东与中央政权联系紧密，为研究明代河东地区行政管理、人员往来及社会地位提供关键线索。

透过这块腰牌，明代宫廷在人员管理、门禁控制等方面的严密与系统清晰可见。它承载着的丰富历史信息，让后人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宫廷生活与管理制度的一角，是研究明代宫廷文化、职官制度及社会风貌的重要实物资料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。